

# “人格”的四重奏:五四运动前后女校学潮中的 群体心理与社会历史(1911-1925)\*

杭苏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关键词:学潮;女子师范;群体心理;人格;女性史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女校学潮中心学生的心理及其得以产生的日常情境与历史环境,试图探讨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对学潮学生的主观性倾向和“捍卫人格”的精神气质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个体心理与宏观结构的关联,才能对学潮女学生的言论与行事有更为共情式的理解。学潮女学生经常提到对“人格”“女子人格”的捍卫。“人格”作为一种话语,除了表达女学生面对外部环境、捍卫独立与自由的社会性意涵,还具有对于历史上传统女性缺乏“人格”的克服与超越;同时,捍卫人格的学潮实践在伸张个人价值的同时,更包含了对“女子人格”这一群体权利的维护。这四重内涵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女学生对于自我的整体性认识,对于理解近代新女性的自我与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 D432.9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21)05-0098-14

##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Women Student Movement before and during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1911-1925

HANG Su-ho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student movement; women's normal college;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women's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sychology of students and the everyday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during the women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Nationalist Period to identify influences of historical and broader social factors on students' inclinations to “defend personality”. It is through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macro structures that we propose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ality of female students' speeches and action during the student movement. Especially, what students often demanded was a struggle for “personality” and “women's personality”. What was indicated by students' discourse on “personality” was about a quartet on not only socially, student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against historical absence of women's personality. But as well, it was about individuals extending their values and potential as well as groups together acquiring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The quartet of these four aspects helped construct female studen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is recognition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new women's identity and personality.

作者简介: 杭苏红(1988-),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妇女史、历史社会学。

\*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西方社会思潮本土化为线索的民国时期的家庭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 18CSH002)的阶段性成果。

## 一、引言:回到学潮学生

一直以来,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潮与学生运动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有支持、捍卫的声音,同时也有批评、反思的声音。比如,在颇为著名的女师大学潮(1925年)中,鲁迅等七位教授公开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为学潮学生摇旗呐喊;而陈西滢诸君却认为学生要以学业为重,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sup>①</sup>。这种学潮评价的分化与对立,并不单单存在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潮之中,而是在全球各类社会运动中都广泛存在。因而,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一直致力于走出这种“对立的评价”,走出或批判或支持的立场,试图以更为客观的视角进行研究<sup>②</sup>。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更为关注运动参与者的主体性经验,回到他们/她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历史之维。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出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运动参与者的观念想法、内在心理与情绪情感,并最终理解他们/她们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的根本性原因。

这样一种社会运动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同样适用于对晚清民国时期学潮的研究。仍然以女师大学潮为例,对于这起发生在中国女子教育最高学府的学潮,近年来的研究切入点要么将其作为妇女运动史中的典型案例<sup>③</sup>,要么将其作为名人研究的重要背景<sup>④</sup>。前者自然是“支持学潮”的典型代表,后者则态度不一,或支持,或批评。而对于学潮漩涡中的学生的心理及其选择,罕有能以共情之方式进行理解与探索的。因而,也难以对学潮爆发的根源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实际上,这些有关学潮学生心理及其日常生活情境的史料,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着相当的数量。这是从群体心理与社会历史情境入手,探讨学潮发生、发展及其影

响的重要方式。

比如,当女师大学潮发展到高潮时,学潮学生曾发表过一段激昂的宣言:“章士钊(教育总长)不唯摧残教育,抑且蔑视、损坏女子的人格,不唯毁损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人格,抑且蔑视全国女子的人格……所以打倒章士钊不仅是恢复女师大,而是恢复全国女子的人格。”<sup>⑤</sup>从这段宣言中,可以感受到学潮学生“反对”教育总长行为背后,革新女子教育,捍卫“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人格”和“全国女子的人格”的努力。不过,如果只停留在这一“人格”话语的表象层面,不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相应的考察,不对学潮事件中诸多复杂的因素与背景进行梳理与辨析,就难以对话语内部丰富的意涵进行探讨,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地“回到学潮、学生及其所处的时代情境”。要想进行这一努力,将涉及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要如何理解学潮抗议行为与“捍卫人格”之间的关系?这只是印证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斯梅尔塞(Smelser, Neil Joseph)等人有关社会运动产生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与“怨恨”的说法吗?这里的“人格”一词和当下流行的用法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性意涵?“回到学潮学生”需要将学潮学生的言论放回到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境之中,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脉络中,解读她们所说的“人格”背后那些隐而未现的丰富意涵。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学潮学生”既意味着回到学潮事件的主体,更意味着回到这些主体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探究他们的思想与心理,从而理解学潮产生的根源。

## 二、文献综述:作为历史环节的女校学潮

学潮是晚清与民国社会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sup>⑥</sup>,很大程度上受到激进思潮、时局动荡等因素的

①参见琪如《“转校”?——亡校》,《妇女周刊》1925年第36期。民国报刊杂志的一些报道、评论虽然也属于参考文献,但对于一些没有署名或者笔名不可考的史料,只列入脚注,不列入参考文献。下同。

②学者桑兵曾统计晚清学潮情况,1902-1911年有史可考的学潮共502次。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之后,学潮更是呈现出普遍化的趋势。比如民国学者常道直统计,民国11年全国学潮共107件,吕芳上统计1919-1928年至少有248次学潮。参见常道直《民国十一年度学校风潮表》,《教育杂志》1923年第1-4期,第2页;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8页。

影响。以往的学潮研究主要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展开,比如探讨学潮、学运<sup>③</sup>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政治功能<sup>[5][6]</sup>;考察学潮与党派之间的复杂关系<sup>[7][8][9]</sup>。这些研究有时也会涉及女校学潮<sup>[7][169][178]</sup>,但是,由于其主要目的是探讨学潮的整体状况,基本上无法呈现女校学潮内部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就学潮研究而言,专门的女校学潮研究确实显得有些无足轻重,甚至有将研究推向“碎片化”的倾向,毕竟,当时的女校学潮数量远少于男校学潮,女校数量、女学生人数也处于绝对少数。不过,从妇女史/性别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校学潮却是探讨近代以来女性成长过程中个体心理心态、人格的重要史料,是考察现代女性历史的重要环节。

随着妇女史/性别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关注被遗忘的女性成为一种史学追求,这使得女校学潮开始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在这方面,妇女运动史研究曾对一些女校学潮有过梳理和介绍。比如,顾秀莲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以女师大学潮为例,介绍了女学生运动的情况<sup>[5]</sup>;吕美颐、郑永福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对学运女领袖进行了介绍<sup>[10]</sup>等等。从当前的历史书写数量来看,这种“运动史”视角的研究,仍是女校学潮研究领域的主流。在该视角下,女校学潮作为反抗封建权威的代表性事件,被整合于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史的脉络之中,成为妇运史的重要一环。不过,在这些妇运史书写中,女校学潮往往只能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并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解读,更不用说对学潮女学生的思想、行为与情感有所探究。可以说,“运动史”的视角有利于探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它也较易忽视具体历史中的细节——比如过程、行动、心态——以及这些细节中蕴藏的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与理论意涵。

与“运动史”视角的长时段书写路径不同,针对具体女校学潮事件的研究呈现出更为多元但同时也更“就事件谈事件”的“碎片化”倾向。不过,这其中仍然不乏一些史料扎实、见微知著的研究,比如,黄湘金<sup>[11]</sup>对民国时期著名女性教育家吕惠如经历的

粹敏女学风潮和南京女子师范学校风潮进行了比较分析;冯杰、任智英<sup>[12]</sup>,刘宏<sup>[13]</sup>对直隶女二师学潮进行了事件梳理;陈漱渝<sup>[14]</sup>、吕芳上<sup>[10]</sup>、陆建德<sup>[15]</sup>、魏善玲<sup>[16]</sup>、杭苏红<sup>[17]</sup>对女师大学潮做了讨论。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更用力于具体史实的考证,并未过多关注女校学潮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件对现代女性生命史的影响;并且,对于女校学潮在妇女史/性别史长时段书写中的位置与意义,也没有进行过多思考。

近代妇女史/性别史书写,一直存在宏观与微观的鸿沟。从宏观视角出发,对近代女性史进行长时段书写的努力,大多摆脱不了妇女运动史话语体系的强大影响,难以自成体系。或许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反拨,社会史视角的女性研究愈加细碎多元。如何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沟通,就显得尤为迫切。本研究试图从“历史环节”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历史环节”由若干同类历史事件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长时段进程中的一环。女校学潮正是这种“历史环节”的典型代表。对于妇女史/性别史来说,有不同的长时段历史表述方式,比如,中共妇女运动史、女性发展史,等等。不论哪种表述方式,都需要处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在对女校学潮的研究中,要充分探讨宏观与微观、历史情境与个人主体之间的关联,尽可能弥补“宏大视角”与具体历史之间的鸿沟。只有对“女校学潮”这一具体的历史环节进行深入考察,才能提供同时回应两者的切入点。比如,探讨社会环境与思潮如何改变了个体的思想观念,如何激发或宣泄了他们的情绪情感,又或者如何调动了他们的政治担当与民族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将宏大史观与微观个体研究进行整合,从而对“社会—个人”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历史性展现。

### 三、公民意识与主观性倾向

#### (一) 学潮产生的“后五四”环境

1911-1925年的女校学潮概况,可以通过保存在报纸期刊、女性自传与研究性论文中的史料进行

<sup>③</sup>对学潮与学生运动的区别,详见吕芳上的区分。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学生以国家、社会等群体利益作为出发点的运动,具有政治意义。学潮是指学校内部的风潮,与学生切身利益有关,反映的是教育问题,间接也涉及政治。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页。

大致的勾勒。《民国日报》及其副刊因为具有国民党背景,对学潮颇为支持,积极刊发过相关报道。日本学者杉本史子曾分析过该报1919年至1924年间报道的29次女校学潮<sup>[8]</sup>。与此同时,上海《申报》、北京《晨报》等报刊也有一定数量的女校学潮报道。另外,民国学者常道直<sup>[9]</sup>曾对1922年爆发的学潮进

行过统计,提及一些女校学潮案例。基于这些材料,本文简要整理了1911-1925年这15年间的43起女校学潮(见表1)。这肯定不是该时期女校学潮的全部案例,它们基本上没有涉及各县级、镇级小学与私立女中的情况。但是,这些资料大致能反映该时期女校学潮的若干特点。

表1 1911-1925年女校学潮一览

序号	爆发时间	学校	事由	资料出处
1	1912年	北京女子师范	拒男监督	《申报》12月14日
2	1913-1915年	武进女师附小	赶走一个算术教员	史良 <sup>[20]P2</sup>
3	1915年11月	济南女子师范	反对校长偏护食堂人员	《申报》11月21日
4	1916年11月	湖北女子师范	反对校长处理自杀事件方式	《申报》11月25日
5	1919年6月	务本女学	一女生登报揭露校方	《申报》6月27日
6	1919年8月	南京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民国日报》8月16日、9月7日《申报》8月22日、9月7日
7	五四运动后	武进女子师范	反对县衙门停办该校	史良 <sup>[20]PP3-5</sup>
8	1920年1月	广东女子师范	拒新校长	《民国日报》1月18日
9	1920年3月	山东省立女子师范	挽留旧校长、拒新校长	《申报》3月27日、4月1-7日
10	1920年5月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	要求国耻日停课	《申报》5月11日
11	1920年9月	湖南女子蚕业学校	拒新校长 校长用兵力迫使上课	转引自杉本史子
12	1920年10月	绍兴县立女子师范	拒新校长	转引自杉本史子
13	1921年3月	杭州女子师范	女学生四人被学校开除	《觉悟》3月7日
14	1921年6月	无锡女子师范	挽留旧校长、拒新校长	《民国日报》6月24日
15	1921年9月	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晨报》10月16-22日
16	1921年10月	周南女校	反对校长 退学	丁玲 <sup>[21]P253</sup>
17	1921年11月	河南女子师范	驱逐教育厅教员 围堵厅长	《申报》11月13-22日
18	1921年11月	武进女子师范	反对换校长	《申报》11月18日
19	1922年1月	上海爱国女学	宣布校长之罪状	转引自常道直
20	1922年2月	武进县立女子师范	反对教员更动	转引自杉本史子
21	1922年2月	湖北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民国日报》11月6日、11月10日; 《晨报》3月1日《申报》4月9日
22	1922年4月	山东济南女子师范	学潮发展为政潮	转引自杉本史子
23	1922年5月	苏州乐益女中	要求建筑校舍未果 退学	转引自常道直
24	1922年6月	安徽省第二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民国日报》6月3日
25	1922年6月	芜湖第二女子师范	登报揭露该校受桐城派控制	《妇女评论》6月2日
26	1922年6月	浙江女子蚕桑讲习所	四十多学生要求撤换所长	转引自常道直
27	1922年9月	湖南第三女子师范	发传单 诋毁校长辞职	转引自常道直
28	1922年9月	长安镇第一女高小	教职员辞职 学生全体离校	转引自常道直
29	1922年10月	山东女子蚕桑学校	要求校长撤换女学监	转引自常道直
30	1922年11月	直隶第二女子师范	对校长的不满高涨	转引自杉本史子
31	1922年12月	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	攻击校长	转引自杉本史子
32	1923年3月	杭州女子师范	开会驱逐校长	《申报》3月28日、4月2日
33	1923年4月	湖北省立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校长调军警	转引自杉本史子

续表

序号	爆发时间	学校	事由	资料出处
34	1923年6月	浙江省立女子师范	围绕教员辞职事, 学生对立, 校长辞职	转引自杉本史子
35	1923年9月	溧阳县立第一女中	挽留现校长, 拒绝新任女校长	转引自杉本史子
36	1923年11月	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反对教员诱学生做妾, 罢课	转引自杉本史子
37	1923年12月	绍兴女子师范	反对撤换他们争取来的校长	《妇女周报》12月30日
38	1924年3月	直隶第二女子师范	武力占领学校, 驱逐校长	《觉悟》4月7日, 《申报》3月31日、4月4日
39	1924年4月	湖北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申报》4月9日、4月25日
40	1924年4月	山东省立女子职业学校	驱逐校长	转引自杉本史子
41	1924年7月	奉天女子师范	向教育厅投诉校长	《申报》7月23日
42	1924年9月	湖南女子师范	驱逐校长	《妇女周报》9月3日
43	1925年5月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驱逐校长、武力占领学校、反对教育总长	《申报》《妇女周报》《晨报副刊》等有大量报道

注: 由于表1内容大量引用自《申报》《民国日报》《觉悟》《妇女周报》《晨报》等报纸, 不方便在参考文献中单独列出, 一律在正文中将所引报纸的出版日期列出, 以供读者查阅。

单就这些学潮的统计资料来看, 呈现出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1) 1919年之后学潮数量明显增多(约占总数的91%); (2) 爆发学潮的学校类型主要是师范学校(约占总数的74%); (3) 学潮爆发的主要焦点是校长的去留(约占总数的65%)。这三点与男校学潮的特征类似<sup>④</sup>, 主要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主人翁意识激增, 官立学校学生对学校不满, 试图通过反对校长的方式给教育部门施压, 推动学校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前两个特征反映了女校学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境。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思想运动, 也是一次“社会改造”运动<sup>[22]P14</sup>, 对之后学潮的涌现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果引用蔡元培的说法, “五四”是“骤用兴奋剂”的时代<sup>[23]</sup>, 那么, 此后的20世纪20年代, 这剂“兴奋剂”仍在个人与群体的思想观念中留有相当的药力。特别是对学生而言, 通过发动学潮来革新教育与政治, 成为一种较普遍的愿景。按照吕芳上对1919年至1929年学潮阶段

性的划分, “五四”到“五卅”(1925年)时期的学潮, “风潮虽在校内, 影响与方向则大抵涉及政治与社会问题”, 这与1925年之后“学生运动的重心几乎全移到学校以外, 学校风潮大抵受校外政治社会势力的指导和推动”颇有区别<sup>[9]P3</sup>。总地来说, 这一时期女校学潮的出现, 主要源于学生的主体性行为, 较少受到政治党派的影响; 而对于女学生来说, 校内革新与校外政治与社会改造构成了她们的双重目标。不论是校外目标还是校内目标, 背后都有其作为“公民”的主体性意识。虽然这些女性是整个女界中特别少的一部分, 但是她们在追求和承担“公民”责任上, 没有丝毫的松懈。

“改造社会”的思潮使女学生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 “爱国”成为参加校外运动的重要原因。在此时期的一些女校学潮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在参加校外爱国运动方面学生与校方的冲突。比如1920年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潮和1925年

④据吕芳上统计, 1919年至1928年间的学潮, “反对新旧校长”者占总数的39.91%, “不满学校设施”者占总数的14.91%。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 第22-23页。女校学潮与男校学潮的这种相似性并不为奇, 女校学潮本身就是全国学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产生与发展不可能脱离整个教育界的学潮风气。

女师大学潮,学生不顾学校反对,逃课参加“五七”国耻日游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面对当时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学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运动”思潮<sup>[24]P428 P432</sup>有着共同的根源。胡适的著名“公式”对此进行了最精辟的说明“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sup>[25]</sup>

而这一时期学潮学生对于校内事务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通过“学生自治”的方式来培养未来的政治“公民”。这股“自治”风潮伴随着杜威(John Dewey)访华获得了相当广泛的传播。杜威在其演讲中比拟了学生自治与民治政府的关系“学校—学生”的关系类似于“国家—人民”,没有学生就没有学校,每个学生都对学校富有“公民”的责任,并且“校长”也类似于“国家元首”,需要人民的“承认”才得以产生<sup>[26]PP163-164</sup>。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之下,1920年山东省立女师学潮时,面对教育厅长“学校之事局外人不能干预”一语,学生答曰:“国家为人民所组织,无人民焉有国家,学校因学生而设立,无学生何用学校,学生对于学校教育之良否,有直接之利害关系,何得视为局外之人,更无所谓干预。”<sup>⑤</sup>由此可见,“公民意识”是学潮背后重要的正义性支撑。

## (二) 主观性倾向

虽然学潮是学生行使权利、反对不合格的校长与教育部门的重要方式,但是从当时的一些报道与后期回忆来看,这一权利的行使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很多学潮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缺乏有效性,学生的很多想法脱离实际情况,本文将其称为“主观性倾向”。这一倾向在当时的男校学潮中虽然也存在,但是正如后文所言,对于受到更大的传统与现代张力的女性来说,这种主观性倾向更为明显。并且,在“后五四”的环境中,激昂的革新情绪与学生运动曾经取得的成就,也加剧了这种主观性倾向的发展。比如,在学潮女学生看

来,“反对校长”是不满于校园生活、自治改革的最重要的方式。可是,将校园革新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为对校长个人的反对,以及寄希望于一个理想中的新校长,显然不能解决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当时的教育界根本无法供给相当数量的、符合学生理想的校长。在这种现实困境的背后,学生的学潮与反抗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意气之争”,颇具主观性色彩。

一方面,这种主观性倾向表现为,在大力驱逐校长的同时,她们对新校长的人选问题,常常并没有考虑,或者想法过于理想化。李文宜曾参加过1924年湖北女师学潮,成功地将校长王式玉赶走。她在晚年自传中曾回忆了一个细节,当学潮目的达到后,她作为学潮积极分子被找去谈话,“你们把王校长赶走了,要一个什么样的校长呢”?李文宜在回忆录中坦然承认,“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而只能给出一个颇显幼稚的回答,“只要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人,谁都可以”。因为,据她听说,“湖北教育界被日本留学归国人士所把持,王式玉也是日本留学的。听说各校校长经常在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压制学生”<sup>[27]P22</sup>。面对关系到学校革新的新校长人选问题,女学生往往能够提出一些抽象的要求,但对实际人选并没有能力选择。比如,有的学生反对女子师范毕业的校长,认为学问资质不够;有的反对女校长,认为女校长的学问没有男校长好;而有的则与之相反,要求新校长是女性,认为女校长更了解女学生教育。这种新校长人选过于理想化的趋势,最突出的一个反映是1926年广东女师范学潮,她们在报纸上提出希望宋庆龄任校长<sup>[28]P217</sup>,而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由于理想的新校长之不易得,教育厅对于学潮的处理就很难让学生满意。很多时候教育厅都采取压制或拖延的战术,偶或更换校长,新校长往往仍旧难以让学生满意,这就使得很多学潮呈现出“不断反抗”、不断更换校长的局面。以女师大为例,该校“近七年来每年皆有风潮”<sup>⑥</sup>,与之相伴的是该校频

⑤参见《山东女师风潮益烈》,《申报》1920年4月1日。

⑥参见《女师大被解散学生与杨校长相持》,《申报》1925年8月6日。

繁更换校长,1917年以后,校长依次为方还(两年零五个月)、毛邦伟(一年零两个月)、熊崇熙(一年零两个月)、毛邦伟(代理,十个月)、许寿裳(一年零七个月)、杨荫榆<sup>[29]PP77-78</sup>。以许寿裳的经历为例,他1922年7月出任女师大前身(女高师)校长,1923年7月,女高师自治会以“溺职务,害教育”之责向他致函,请其辞退;8月2日,自治会再次发布宣言,谢绝校长许寿裳<sup>⑦</sup>。最终他于1924年2月选择辞职。可以看出,此类以“校长”为反对目标的学潮,很难从根本上革新教育。当一个学校陷入此种“不断反抗”的消耗战,其对于学生培养、学校管理的革新就更难施展。

另一方面,就学潮女学生而言,她们的主观性倾向还表现在其求学生涯中“不断反抗”的个体选择。以女作家丁玲为例,五四运动期间,她就读于湖南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因学校在“五四”期间不准学生上街游行,颇感学校守旧落伍,向母亲提出“不愿居师范,欲到省会考中学”<sup>[30]P306</sup>。在如愿考入当时以开明趋新著称的周南女中后,不到一年,校内发生反对校长的学潮,她“觉校长太固执了,此非养育人才之教授者”<sup>[26]P311</sup>,转而投考首开男女同校之风的岳云中学。可是,不到半年,丁玲仍觉得该校让人失望,便放弃还有半年就将到手的中学文凭,随昔日同学王剑虹远赴上海,进入了平民女子学校。随即又感到该校课程水平“不是很系统”,“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读些书”<sup>[31]P302</sup>,于是又和王剑虹一起去了南京,开始了一段游荡的生活。不满意学校的教育与管理,又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在何处,因而在整个求学生涯中不断经历学潮、转校,这恐怕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中的个体都曾经经历过的状态。比如,在男性知识分子郭沫若和胡适的自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sup>[32]P17 [33]PP45-47</sup>。对于年轻的丁玲来说,虽然她能够较容易地成为一名小学教员,但这并不是她的自我期许。从桃源师范这一比较保守的官办学校,到当时湖南最开明趋新的女子学校——周南女校,再到湖南首开男女同校风气的岳云中学,最后不远千里、进入上海的中共平民女子学校。可以说,丁

玲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抗式转校”中寻求理想的“学校”,寻求能够促进自我成长为合格的“现代女性”的校园环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只从自我需求与自我情绪出发,对于外在环境没有适当的认识与判断,这种“不断反抗”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潜在消耗”呢?问题的关键是,对教育不平等的改革、对女子人格的捍卫,能否冲破意气之争的面纱,深入体制与社会问题的肌理?要想达到此种改革的深度,需要女学生对于现实社会、教育体制与自我都有更多的、客观的了解。可是,综观这一代女学生所处的日常校园生活、社会环境以及她们成长经历中所感受到的时代变迁、社会思潮,不仅无法提供这种客观性认识的培养基础,反而在助长、推动着她们主观性倾向的发展。可以说,这批成长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女性,在当时历史与社会的双重时空下,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心理与精神气质,而这些心理和精神气质在学潮事件中有着比较充分的展现。

#### 四、主观性形成的日常情境

理解这种主观性心理的形成,需要回到她们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与社会历史时空之中。对校长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校园生活与学习的不满,那么,其时的女校生活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些作为“女界前途”的女学生来说,她们有关校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到底存在何种程度的差距,以至于在条件并不成熟(比如对新校长人选缺乏考量)的情况下,仍要选择不计代价的不断反抗?她们所感受到的、因而也不得不起身反对的社会性压抑来自何处?对此,近一个世纪之后、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我们,更需要共情式的理解。作为“女”学生,她们身上的“性别特征”使其不可避免地处于现代与传统两种思潮最激烈的撕裂处。现代思潮对“女性解放”“妇女运动”的宣传愈热烈,愈映衬出那些仍保守着传统女性观念的场域令人难以忍受。女子教育的发展,虽然是中国社会“趋新”、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但是如果深入当时女子教育这一场域的日常性情境,则很容易发现,女子教育在管理、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很多方面,都与“现代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平等”相距

<sup>⑦</sup>参见《晨报》1923年8月4日。

甚远,呈现出与公民自治等新教育理念不相匹配的“全方位监管”色彩。

### (一) 管理方式与道德标准

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女子学校的管理方式与道德标准都更为严苛。处于此种管理之下的女学生,离独立、自由的“女公民”形象实在是相距甚远。以书信自由为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曾赋予“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但在当时中等教育水平的女校中,为了防止男女恋爱及其他有伤风化的事情发生,女学生的书信要受到严格的检查。1919年闹过学潮的南京女师,就对学生书信进行严格检查“一般除家属外,不准随便通信。即使准你通信了,但私拆信件是舍监的经常工作之一。”<sup>[B4]P24</sup>到了20年代,女师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以至于报纸上频频出现呼吁女校通信自由者。比如1920年2月,身为北大学子的易家钺就曾在《晨报》上呼吁女高师(即后来的女师大)“不可检查”学生书信<sup>⑧</sup>。1923年5月,署名“筱晴”者批评湖南省立第三女师检查学生书信<sup>⑨</sup>。报纸上展开的这些讨论,将女师范学生通信不自由的情况广泛传播,这一校园内部的严苛管理为更多新式知识分子所了解。1924年,一位男性读者看到《妇女杂志》上登载了某女校教职员为防学生堕落而拆检信件之事,才猛地意识到“啊!原来女学生到现在还没有通信的自由呵!”随后,他以此事询问学生,后者告诉他,“据他们所知的女子学校中——尤其是中等学校——实行这种办法的很不少。虽不能说检查信件是女子学校的普遍的规定,但这种办法在女子教育方面却也有了长久的历史”<sup>⑩</sup>。由此反观,也可以看出这种女师范学校通信不自由的日常校园环境,在很长时期内并不被社会上一般的知识分子所了解。

与检查书信类似,女学生在出入校园方面也缺乏自由。任桐君在回忆1919年南京女子师范学校

生活时曾提到,女学生的一切行动都要在家长或校方的监督之下进行。“本城学生每隔一星期可以回家一次,家人拿‘对牌’来接。外地学生有亲友在南京,遇事须外出,在每学期开始,由家长专函校方,方可发给对牌。否则就是记过一次,大加训斥。”<sup>[B01]P23</sup>如果出现了紧急状况需要临时出校门,比如任桐君曾手指生疥疮,需要出校医治,“每次去,一定要雇三辆黄包车,前头坐的是老陈妈,后面坐的是徐蕴卿先生;我则好似被押解的囚犯,坐在中间”<sup>[B01]P23</sup>。这与1921年浙江省立第一女师(杭州女师)的管理方式非常相似,一言一行几乎都在保姆的监护下进行,比如“除星期六下午三时至四时,和星期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一概不准出校”。“凡学生家属,都给一竹牌……和伊们谈话,须拿此竹牌……谈话时,并有老妈子在旁察听,将伊们所谈的话,详细记牢,报告校长。”<sup>⑪</sup>

这种严格的管理并不是出于女校校长或者女校管理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当时一般的社会心理对女学生道德的严苛要求。上文提及的1919年南京女子师范学潮中,面对学生对管理过于严苛的责难,学校为自己做了如下的辩护:“一般社会心理对于学校责望甚严,而省厅两长官亦迭有明令、责成约束,因之敝校管理不无稍从严格。”<sup>⑫</sup>这正反映了女校特别是女子师范管理与约束的历史性根源:社会心理与当时的政府当局很大程度上还沿袭的是传统女性道德理念。因而,出于对女学生名誉的爱护,中等学校的女学生在通信、出入校园、社交、发型服饰方面均无相应的自由可言。这在当时教育部、各省政府的女学训令中颇能窥见一斑。1916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向各省教育厅颁布的惩戒女学生规定要求:“(一)不准剪发、违者斥退……不准无故请假、结伴游行,违者记过两次……不准自由结婚,违者斥退,罪及校长。”<sup>⑬</sup>1924年,湖北省长萧耀南发布严禁女

<sup>⑧</sup>参见《晨报》1920年2月15日。

<sup>⑨</sup>参见筱晴《一封攻击湖南女界的信》,《妇女评论》第92期,1923年5月23日。

<sup>⑩</sup>参见渭川《学校检查女生书信问题》,《妇女周报》第16期,1923年12月5日。

<sup>⑪</sup>参见余孤《杭州女师范底详情》,《觉悟》1921年3月7日。

<sup>⑫</sup>参见《江苏省立第一女师学校公布》,《申报》1919年8月26日。

<sup>⑬</sup>参见《南京快信》,《申报》1916年9月27日。

学生剪发、限制服装的训令,江苏省省长韩紫石发布整顿女学训令<sup>⑭</sup>,均沿袭了此严苛的管理。他们的理由是,女子在道德方面“稍不自检,小之为名誉身家之累,大之为人心世道之忧”<sup>⑮</sup>。这也说明,一般社会心理对女子独立、自由的革新浪潮仍持怀疑态度。

## (二) 教育目标与课程师资

女子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和师资经费等方面,均与男子教育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民国以来一直提倡男女教育平等的理念,但在教育目标上,并不特别提倡女子追求学识;在教学内容方面,也比男性要求要低,只希望将女性培养为一般的师范人才。这固然与当时男女教育的巨大悬殊有关,比如,据1918-1919年全国教育统计,初等小学生中女生占比4.30%,高等小学学生中女生占比5.54%;1922年,中学生中女生占比3.14%;1921-1923年的大学生中,女生占比2.54%<sup>⑯</sup>。与晚清时期的情况相比,女子教育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男子教育相比,仍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因而,对于这一小部分精英女性来说,如何确定对其的教育宗旨,就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他们似乎颇为矛盾和犹疑,在承认女性性别独特性的“贤妻良母”教育和更加强调“男女平等”的两性同质性教育之间犹豫不决。

可是,对于这些已经进入新式学堂的女学生来说,一种关于“平等”的信念显然超越了对于自身性别的体认。如果首先不是一个和男性一样的“人”,那么那些关于性别的体认又将附着于何处呢?为此,1920年京津各女校联合女生500余人到教育部请愿,提出“改善女子中学课程,与男子中学统一”;“增设女子补习学校,养成中学生直入大学资格”;“女校经费和男校平均分配”;“留学生官费名额,男女平分”四项要求<sup>⑰</sup>。这四项要求希望赋予女性和男性一样的升学机会,在教育经费、留学生官费名额

上拥有同等的资源,并且希望通过增进女子中学课程难度、增设女子补习学校,使更多中等教育程度女性能与男性竞争、获得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这一声势浩大的请愿事件,显示了女性知识群体希望在才识上与男性比肩的愿望,也反映出当时女子教育并不以培养高水平的知识女性作为其理念。

在课程设置与师资经费方面,女校学潮学生也颇多不满。1911-1925年正处于民国政治动荡时期,由于官方经费拮据,作为公立学校的女子师范颇为艰难。而新式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足够数量的合格老师和足够丰富的课程设置。因而,很多女子师范学校都存在课程设置随意、缺乏合格教员与教学设备的情况。比如,在1922年安徽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潮中,学生们就指出“我们女师的课程紊乱不堪,有的一天七小时,有的一天三小时。至若二年级历史,本学期连教员也没有。”<sup>⑱</sup>又比如,1924年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潮<sup>⑲</sup>、1923年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潮,学生都对师资不足、缺乏教学设施提出过抗议<sup>⑳</sup>。1924年,直隶第二女师学潮爆发时,向警予就曾敏锐地意识到,该事件反映了女学生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增进男女教育平等的愿望。她指出,“伊们在知识上,要求提高伊们的知识水平线,因而主张男女同学,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反对低级的女子课程,反对低等的女校教员”,而这种追求是由于她们“不满意现在的中国女子教育”,是一种和男性一样的“人的自觉”<sup>㉑</sup>。

综上所述,女学生主观性倾向产生的日常性情境包含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学生自治、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的理念宣传与现实校园生活中“全方位监管”、发展落后、侵犯隐私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到1919年以来教育界有关“学生自治”的提倡,学生自治和培养“女公民”,早已成为这些女学生的内在期许,可是,作为已经具备自治意愿与自治

<sup>⑭</sup>参见《社评(二)》,《妇女周报》1924年4月2日。

<sup>⑮</sup>参见《社评(一)》,《妇女周报》1924年4月23日。

<sup>⑯</sup>参见《吾国女子教育平等之曙光》,《妇女杂志》1920年第6卷第11号。

<sup>⑰</sup>参见拜梅女士《芜湖二女师将被改造的情形》,《妇女评论》第44期,1922年6月7日。

<sup>⑱</sup>参见《直隶二女师突起风潮》,《民国日报》1924年3月19日。

<sup>⑲</sup>参见《浙女师学生驱逐校长》,《民国日报》1923年3月28日。

能力的个体,她们却要时时刻刻处在教职员、保姆的看护与管教之下,缺乏起码的自由可言。虽然接受了自己的“公民”身份,但这种自我认同并不被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认可。因而,在她们看来,这些严苛的管理制度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威管控,严重妨碍了她们成长为独立、自治的“女公民”。处在这样的“封建权威”之下,她们作为公民的自治精神无从施展;抑或稍加施展,即与学校之管理产生冲突。也正因此,“学生自治”的思潮在舆论中传播越激烈,这些新女性内心对于学校管理的愤慨就越澎湃,最终不顾客观因素限制而爆发学潮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有关男女教育平等、男女平等的理念是她们寻求自己成为一个和男人一样的“人”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百个学生中仅有的三四个女性,“凤毛麟角”的她们有着对女子教育发展、女界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可是现实教育中女子教育的落后显然剥夺了她们成为和男性一样的发展道路,加剧了她们不顾条件限制进行学潮革新的冲动。丛小平<sup>[7]</sup>曾提醒我们,1911-1925年进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女性,主要来自于中国广大村镇的乡绅家庭。与大城市富裕家庭出生的女性有机会进入中学、大学、教会学校、私立女校乃至出国留学不同,城镇乡绅家庭出生的女性,求学只能走官立学校的途径。由于来自村镇,缺乏足够的家族资源,她们的未来发展只能凭借自我的奋斗;同时,她们对女界各种落后状况更为了解,为女界求发展的愿望也更为强烈。所以,在感受到校园生活的诸多不如意后,她们往往选择揭竿而起,为看不到希望的个人发展与女界发展“奋力一搏”。

### 五、“人格”与女校学潮

主观化倾向与日常情境构成了学潮产生与发展的两股力量。“主观化倾向”是主体的外在呈现,是一种外显的表象,即他者审视学潮主体时易于觉察到的主要特征。与之对应,“日常情境”则是客观性的存在,是外在环境的力量。日常情境愈压抑,主观化倾向愈发展、愈凸显。正是这两股力量的交织与相互推动、激荡,促成了学潮事件的爆发,产生了学

潮中人的整体性精神状态。如果要对这种整体性精神状态进行描述,可以使用学潮女学生一个通用的说法——“捍卫人格”。在本文的引言中,曾引用过女师大学潮中有关“捍卫人格”的论述,这种有关“人格”的诉说,是学潮学生内在心理、情绪与情感的反映。它虽然与“主观化倾向”一样,都是对学潮个体精神状态的反映,但是与“主观化倾向”的表象化特征不同,它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学潮主体的内在心理,因而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学潮学生的状态。

“人格”一词以相当高的频率出现于学潮之中,成为女学生主体性表达的关键词汇。除了前文所述的女师大学潮宣言,还有一些例子。比如,1921年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潮,省教育厅逼迫学生承认新校长。全堂学生大哭,认为“被人欺侮蹂躏,至于此极,再则以彼辈狼狽为奸,女学前途尚有何种希望可言……我们的人格是要紧的;万一运动失败,宁肯全体开除,不可屈服”<sup>①</sup>。1922年,针对女校禁止女生剪发的情况,武汉学生联合会在《妇女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侮辱学生人格的鄂女师规约》的文章<sup>②</sup>。这种有关人格的宣告与捍卫,揭示了学潮事件、日常社会环境与校园环境,对女学生个体心理的影响。对女子人格的捍卫与实现,成为反抗日常生活中自由缺失、男女教育不平等以及追求女性作为“公民”的政治理想的内在动力源泉。那么,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人格”?为什么学潮和个体的“人格”相关?学潮女学生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使用此词汇?

“人格”一词的现代用法,初创于日本。在20世纪初,它主要被用于法律讨论,强调个体作为人的权利<sup>③</sup><sup>[8]P150</sup>。不过,该词很快就被用来形容“人”的本质属性,即人之为一个基本要求,其中包括独立、自由等现代精神。叶圣陶在讨论女子人格问题时曾指出,人格是“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sup>[9]P253</sup>,这意味着在叶圣陶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具有人格的女性是独立的、健全的,只有这样的

<sup>①</sup>参见《重庆女师生争人格之大运动》,《晨报》1921年10月16、18、19、20日。

<sup>②</sup>参见武汉学生联合会《侮辱学生人格的鄂女师规约》,《妇女评论》1922年第56期8月30日。

<sup>③</sup>参见《人格与权利》,《大陆》1902年第2期。

女性才能和其他同样独立健全的男性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大群”——社会。如果以此标准考察当时的女学生,不难理解她们将学潮作为“捍卫女子人格运动”运动的缘由:她们所处的校园生活管理严苛、缺乏独立与自由、在教育目标和水平上与男校差距颇大,这些不仅不利于她们“独立健全”地成长,更是对她们作为“现代个体”的人格之侮辱,即不将其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看待。换个角度来说,改革女校、缩小与男校的差距、反对学校的各项严苛管理,与男性拥有同等的自由,这些都是女性作为一个“有人格”的“人”的应有之义。在这些生动的历史情节中,可以看到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如何具体地以“人格”的理念内化于女学生心中。这是女学生“捍卫人格”的第一层意涵,也是最表象的社会性内涵,通过学潮的方式反抗侮辱、侵犯其人格的校园管理、教育体制和个人。

这种对女学生人格的捍卫虽然发生于日常社会环境中,但却有着比较深远的历史性成因:以现代眼光来看,历史上的女性曾长期处于“无人格”的状态。上文曾指出,“独立性”往往被视为一个现代个体拥有“人格”的重要体现,即“独立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个体试图将自己与传统社会中的个体相区分,“独立、自由、平等”构成了他们的本体性要素,而那些生活在依附性关系中、缺乏自由与平等的人,则被划分到“传统封建”的序列之中。对于女性来说,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对张关系在她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们的参照群体除了男性以外,还有以往历史中的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基本上都处于依附性关系之中,缺乏独立性。因而,为了与这些传统女性形象相区分,这些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女学生始终保持着相当强的“现代女性意识”的警觉,对于自我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以及自我的人格是否受到承认格外重视和敏感。与男性相比,她们更难摆脱“依附性”,更难获得职业、收入、自由思想与自由意志。因而,她们也更加渴望和珍惜自己的“人格”。她们需要尽力撇清自身可能存在的“依附性”,坚持更为彻底的独立

与自由,才能实现作为“人”——实质是指作为“现代人”——的主体性身份。因而,对她们来说,学潮是现代女性群体作为一个新的声音,在现代历史中为中国女性之尊严发声的历史性时刻。

女校学潮的“人格”话语,除了这种“社会—历史”意涵之外,还涉及“个体—群体”两方面的意涵。“人格”一词原本就是针对个体而言,是对个体“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的捍卫,因而其个体层面的意涵并不难理解。但是在学潮中,更多的时候“人格”一词前面都被加上了若干定语,比如“女子的人格”“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人格”“全国女子的人格”,等等。这固然与学潮宣言的书写策略有关,以群体名义的宣言显然更有抗争性。但是,无法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女学生对于女性群体有着相当的使命感。以女师大学潮为例,只要稍微回顾学潮高潮时这些女学生“欲以身殉校”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对于女性群体的使命感并不是一纸空谈。1925年,女师大学潮达到高潮,从捍卫自我人格、“女师大全体学生的人格”到捍卫“全国女子的人格”,学潮矛头最终指向了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北洋政府<sup>②</sup>。当时,校内已“停止供应饮食”“截断电话”,但学潮学生仍不愿离校,啃着干面包轮流守卫校门,不让他人进入。她们从报纸上得知政府将派警察和女仆来拖其出校,面对即将到来的暴力冲突,“一夕数惊,轮流守夜,稍有震动,胆破欲裂”。如果此时选择自动出校,大可避免接下来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是,她们仍旧坚持与教育行政部门对抗,“消极的封锁校门,聚哭一堂,静等着强暴的来临”,因为她们“已抱定校存校亡,共此休戚”<sup>[60]</sup>。当这一暴力冲突最终来临时,多名学生受伤,“散发披襟、血泪满脸”,“抢地呼天,骂不绝口,谓欲以身殉校”。最严重的李桂生“直挺挺的在院里地下躺着,满身的衣服都撕破了,满身上都成了青紫色的凸起,她闭着眼睛,口边流着白沫”<sup>[61]</sup>。这种奋不顾身的斗争与牺牲,既是对自我前途与人格的捍卫,更是对中国女性群体前途和人格的捍卫。此时的个体与群体之间很难说能够区分彼此,更多的是休戚与共。从这种对女性群体人格的捍卫可以

<sup>②</sup>参见《申报》1925年8月25日的报道。《申报》于1925年2月至9月间对女师大学潮进行了长期关注与报道。

看出,女学生有关人格受辱的心理感受并不只是个人的体验,它与女子的“性别”有着重要的关系。因其性别身份,女性在现代性起始阶段处于弱势位置,比如独立性的历史性缺失、自由的历史性缺乏,这使得新式女性在追求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上,对该群体现代身份的获得有着密切的关注和很强的使命感。因而,发动学潮的群体心理不只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发展”“个体主义发展”,更是对于女性群体发展的关怀。在这些学潮案例中,女学生所捍卫的人格不仅是个体的人格、全校女学生的人格,更是全国女性的人格,三者是相互关联的,“个体—小群—大群”之间缺一不可。

更进一步,作为一名现代“女公民”,学潮女学生也试图为国家和社会担负其责任。不过,综观1919—1925年的女校学潮,这种政治理想更多地具体化为对教育革新的要求、对校长和教育行政机构的反对。这与五卅运动之后,特别是北伐革命时期学潮学生对于现实政治的直接参与仍有一定的差异。不过,正如前文引用杜威之语所指出的,这种革新教育的努力背后已经潜藏着参与政治、社会改造的内在愿景。

有关“人格”的这四重内涵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学潮女学生的整体性形象。从这种内在的复杂性中可以看出,对于学潮的爆发、学潮女学生的言论与行事,均难以进行简单的是非评断。“人格”话语所展现的社会、历史情境与个体、群体要素,共同构成了女学生参与学潮的现实处境与内心图景。在这种人格的“四重奏”之中,可以看到一个处于新与旧、私与公的交汇路口的“人”的总体性形象,这既包括她外显的表象特征,也包括她内在的心理与情感。对于这样一位学潮主体来说,面对日常校园生活的压抑性环境,以及女性历史上“非人格”的依附性地位,她试图为自我与女性群体“捍卫人格”、追求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这种“人格”运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之强烈,以及参与者所感受到的日常环境压抑、女性历史性附属地位之强烈,促使学潮运动不顾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沿着某些主观性倾向发展。

## 六、小结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对民国时期(1919—1925

年)的女校学潮进行了研究。从表面的现象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校学潮呈现出“不断反抗”的主观性倾向。它既反映为一些学校不断发生学潮事件,也反映为一些学生在求学经历中不断退学、闹学潮。针对这种主观性倾向,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其所形成的日常社会环境及其历史性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潮学生的内在心理。学潮的产生大多源于学生对“人格”的捍卫,这里的“人格”具有多重内涵。首先,它最表层的意涵是对当时校园生活中压抑、严苛的环境的反抗,以此捍卫自身作为“人”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其次,这里对“人格”的重视还源于历史上女性缺乏独立性的事实,因而,“人格”作为现代女性重建自我身份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最后,“捍卫人格”除了捍卫个体自身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外,更包含着对“女子人格”这一群体权利的伸张,是学潮学生自觉成为女性群体命运担纲者的体现。正是在“人格”的这些多重面向中,可以看到女学生在当时的社会与历史时空下、在个体与群体的关联中不得不进行抗争的内在缘由。虽然从外部评价来看,当时的学潮出现了主观性倾向的发展趋势,但这无疑是各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无可奈何的最终选择。对于学潮研究来说,“回到学潮学生”就是要回到这种复杂情境中的个体心理,以此来更加努力地接近学潮事实。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人格”话语背后有关社会、历史、个体、群体四个方面的意涵,能更客观地探讨近代女性史中宏大命题与个体心理之间的关联性问题。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对变量分析、因果链条等实证主义方法的反思,如何捕捉到社会中“人”的行动、心态、情感与观念,是当前社会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sup>[41]PP183-189</sup>。在这方面,性别议题有着天然的优势。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比如性别社会学、妇女史、女性文学等,它们的研究主题通常围绕女性主体或者某一具有特定性别身份的个体展开,因而,它们更加关注这些个体的观念、情感与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察民国时期的女校学潮,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史梳理,更是对女性群体心理与实践的探究。一直以来,“妇女问题”都被视为民国以来最重要的社

会问题之一。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女性”群体的自身特质与时代遭际,使其成为考察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重要透视口。在现代个体的重塑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更为典型<sup>②</sup>:从传统社会中“没有人格”的依附性个体,变为一个和男子一样拥有独立、自由的现代个体,这些女性经历了从“无人格”到有人格的过程,对她们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展现现代个体的重塑历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使用“女性失语”这一性别研究的概念,学潮女学生的言行与经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书写中消失了。要想尽可能理解她们作为真实的历史个体的存在样态,无疑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相关史料的稀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

问题;与此同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历史研究中“真实”与“建构”的反思<sup>[42]</sup>,对于本文也同样适用、发人深省。面对这些挑战,本文坚持将女校学潮作为近代女性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研究,是因为该议题具有理论与方法论的双重追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是从中观层面的一次努力,试图将学潮群体的心理与行动,放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境之中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从而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联。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为真实地接近学潮爆发的原因以及学潮过程中个体的心理心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同时也是对中国女性的现代性身份与认同的研究,是一个回到“主体”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陈西滢.闲话[J].现代评论.1925(38).
- [2]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5(1).
- [3]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 [4]葛飞.论战中的师爷气与“流氓鬼”——以女师大风潮中的周作人为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3).
- [5]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J].历史研究.2011(1).
- [6]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J].近代史研究.2004(5).
- [8]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J].历史研究.2005(4).
- [9]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10]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11]黄湘金.权威的失落与主体的新变——吕惠如与南京女学风潮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
- [12]冯杰、任智英.直隶女二师学潮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 [13]刘宏.“女界先锋的进攻”——1924年保定女二师学潮[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6).
- [14]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15]陆建德.母亲、女校长、问罪学——关于杨荫瑜事件的再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8).
- [16]魏善玲.杨荫瑜与“女师大风潮”[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 [17]杭苏红.无根之“群”: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许广平及其经历的女师大学潮分化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5(6).
- [18][日]杉本史子.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潮和女学生的动态——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为主要资料[A].梁景和主编.首届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19]常道直.民国十一年度学校风潮表[J].教育杂志.1923,15(1-4).
- [20]史良.史良自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 [21]丁玲.致胡延妮(1978年书信)[A].丁玲全集(第11卷)[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sup>②</sup>这一论断的依据是男女两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克服的阻力大小。有学者也指出由于改造妇女成为晚清以来民族革命的重要内容,“精英阶层的妇女比其他人更深地受到了晚清的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从而使女性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紧密相连。参见[美]季家珍著,杨可译《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10页。

- [22]杨念群.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 [23]蔡元培. 在北京大学话别会演说词[J]. 北京大学日刊, 1920-10-20.
- [24]Schwartz, Benjamin L. 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urth and After[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5]胡适、蒋梦麟.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N]. 晨报, 1920-05-04.
- [26]杜威. 学生自治[J]. 新教育. 1919 2(2).
- [27]李文宜. 李文宜回忆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28]鲁迅、景宋. 两地书·原信[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 [29]何玲华. 新教育·新女性: 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30]余曼贞. 丁母回忆录[A]. 丁玲全集[G].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31]丁玲. 早年生活二三事[A]. 丁玲全集(第10卷) [G].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32]郭沫若. 少年时代[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33]罗志田.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4]任桐君. 一个女教师的自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 [35]俞庆棠.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A]. 李又宁、张玉法编. 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1辑) [G].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
- [36]向警予. 直隶第二女师学潮在女子教育革新运动上的价值[J]. 妇女周报, 1924 (33).
- [37]丛小平.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38][美]汤尼·白露著 沈齐齐译.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39]叶绍钧(叶圣陶). 女子人格问题[J]. 新潮, 1919 1(2).
- [40]石评梅(笔名漱雪). 女师大惨剧的经过[J]. 妇女周刊, 1925 (37).
- [41]Abbott, Andrew.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42][美]海登·怀特著 陈新译. 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绘山